

我的边缘化，实在不仅只在我没有师从名人，更在我的学术兴趣。

我坚信任何分类只代表人类的智力局限，以及可由此获得解脱和理解的方便而已。

江山/著

历史文化中的法学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LAW

- 生存与文化导向
- 论中国人的精神背景
- 略论参与世界文化潮流的现代中国
- 剥夺政治权利考
- 礼论
- 以恶制恶：法治的起源与理念
- 法律革命：从传统到超现代

法律出版社



西南政法大學 學子學術文庫

历史文化中的法学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LAW

江 山/著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化中的法学/江山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9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
ISBN 7-5036-4451-6

I. 历… II. 江… III. 法学—中国—文集 IV. D92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264 号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董彦斌

装帧设计/曹铖 胡欣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法学学术出版中心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张宇东

开本/A5

印张/11.625 字数/303 千

版本/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电话/010-63939796

网址/www.lawpress.com.cn

传真/010-63939622

法学学术出版中心/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电子邮件/xueshu@lawpress.com.cn

读者热线/010-63939657

传真/010-63939701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100073)

传真/010-63939777

中法图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客服热线/010-63939792

中法图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网址/www.chinalawbook.com

中法图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电子邮件/service@chinalawbook.com

中法图苏州公司/0512-65193110

书号:ISBN 7-5036-4451-6/D·4169

定价:25.00 元

西南政法大学 学子学术文库

历史文化中的法学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 任：梁慧星 龙宗智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向 王卫国 尹 田 江必新

李 林 李连宁 张广兴 张建田

张新宝 张智辉 青 锋 卓泽渊

贺卫方 顾培东 黄松有 夏 勇

梁治平 景汉朝

秘 书 长：方 向 茅院生

总 序

西南政法大学建校至今已历 50 寒暑,中间虽遭遇“文革”之乱,停办近 10 年,但仍有 10 万之众的莘莘学子前后就学于此,歌乐山魂培育浩然正气,嘉陵江水滋养人文精神。10 万毕业生活跃于神州大地,为国家法治大厦之建设添砖加瓦,贡献才智,已形成法律界广受关注的西南法律人群体,造就了西南法律教育与这里的毕业生独特的品格与精神。

在校庆 50 周年到来之际,西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联谊会与法律出版社联合推出“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这是对我们的母校 50 华诞的献礼,是对这所中国法律教育与学术研究重镇所取得成就的一次检阅,同时,我们也希望这 50 部著作能够成为后来者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的道路上继续跋涉的阶梯,此外,还希望通过这些著作,能够向读者昭示西南政法大学的传统与精神。

体现在西南教育过程中以及学子著述里和行为上的品格与精神首先是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参的话最能够表现中国知识人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过,近代以降,由于引进了西方的学术与教育制度,知识人有了不同的专业,因此在忧国济世与专业追求之间会有某种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一种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未曾存在过的新专业人士的法律人,他们与其他领域的人相比,在当今的中国注

定要遭遇更多的坎坷。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律教育很快就处在受抑制的状态。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前期如西南政法学院等政法学院的成立与其说是对法律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如说是限制法律教育的举措。因为每一所政法学院都是在合并若干所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政法学院的出现其实大大缩小了中国法律教育的整体规模。比规模更重要的变化是,“政法”这样的概念所预示的法律教育内容与目标与既有传统的断裂。

因此,在政法学院里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态之中。我们看当时涉及法律教育的主流话语,完全是排斥法治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排斥愈演愈烈,终于导致法律教育的完全停滞。教师下放劳动,学校纷纷解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界知识分子的忧患真正是刻骨铭心,难以排解。文革浩劫之后,法律教育虽然恢复,法治建设也逐渐提上日程,但是书本上法律理论与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仍然是法律人经常面临的巨大痛苦。尽管位居西南,多少有些“处江湖之远”,但是这种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的忧患意识却没有须臾少缓,甚至正因为与政治中心距离的遥远而更有所强化。

在法律教育以及法学研究方面,这种忧患意识与理性和开放的精神相结合,形成了西南法律人好学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自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尤其是复办后的一段时间,校园里面百家争鸣,学术墙报放言无忌,新论叠出,一些观点或论证,今天读来,或不免稚嫩,但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却颇有石破天惊之感。正是这样的校园风气,培育了西南法律人那可贵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怀疑和批判不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广阔而深邃的知识积累基础上的理性论证。最初,设置单科型政法学院的目标正是为了培养偏于技术化或工匠型的法科人员;不在一个综合性大学里,学生以及教师的知识视野就必然受到限制,批判精神便无从发育。然而,西南法律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并且付出极大的努力,力求突破这样的局限性。图书馆里

的手不释卷,山阴道上的玄思妙想,宿舍卧谈中的唇枪舌剑,无不显示出这所专业略嫌单一的大学中的师生们不拘泥于法学一科、寻求超越的努力。这样的追求在我们的毕业生身上已经有多样化的体现:除了那些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们经常在作品中显示出他们多学科的知识修养之外,不少校友进入政坛,或从事着法律之外的业务而且胜任愉快,一些人甚至成为戏剧作家、旅行(作)家、诗人、哲学家。相信随着母校向综合性大学的不断迈进,我们的毕业生在这个特色方面将更加令人瞩目。

对于人而言,50岁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但是,就大学而言,50岁只能说是世界大学之林中的一颗幼树。尽管我们的母校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和传统,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需要为建设一所伟大的大学而作出艰巨的努力。作为校友,在献礼的同时,我们也表达对母校美好前景的衷心祝福,祝愿母校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祝愿我们的校园永远桃李芬芳,祝愿我们的校友人才辈出,在不断提升母校地位的同时,也为整个国家法治大业的成就作出更多的贡献。

邈邈学府,在蜀山中。孜孜弘道,惟我学子。

《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编委会

2003年8月6日

回到“西南”(代序)

20 年前——

这通常是一位世故老人的行话，一不留神，我也要如此说，心中可謂是油盐醬醋，五味俱全了。

—

那年的9月8(7)号下午，经过三天两夜的溯流西进，我终于抵达了朝天门码头。兴奋、激动中突然来了不少诧异：

几天的船上生活，除偶尔与同舱的船友聊聊外，便是看书，或是上船顶独赏三峡风光，浑然未觉同船来重庆上学的同学是如此之多，下船的忙乱、挤闹中看到的不是箱子，便是行李。

一惊未了，复被高拔耸立的街区所胁迫，不得不举颈仰望：真是高哇，难怪叫朝天门。

说是心情激动，其实是身不由己地随了人流漂上了趸船，那个忙乱，直是我这个痴长了21年的乡下佬不知所措的。就在这手忙脚乱、瞎跌瞎撞之中，倏地又发现自己已被一群抱着、提着、扛着棍棒（外挂一串绳子）的“棒棒军”包围了，无数双手抓住我一箱一被的挑担，要帮我挑上那高高的天街。这回我倒是有主意：哼，小瞧人啦，这

点东西犯不着你们帮忙,我是响当当的农民出身!我是一口气上来了。结果发现自己只有瘫倒的份儿,进出气的功夫完全不知是谁帮我做下的。真是个不上高山,不履平地。

第一次走出200公里以外,远离家乡故土,独自一人来到四川重庆,一个封闭环境中出生、成长的土疙瘩具备的可怜见识和无知,着实让我出尽了洋相。

先是在船上吃饭,实在囊中羞涩,看着天价的饭菜流着口水却无法抉择,好不容易看见一份便宜的,名为苦瓜(从前未见过),内中窃喜,便不加思量地要了一份,不料才进得口中,即苦不堪言,愤怒之下,把它倒了。一面吃着白饭,一面怪罪城里人;他们怎么好拿烂瓜来骗人。

后来客船在万县停泊过夜,同船的船友告诉我此处的饭食非常便宜,不妨下船吃晚饭。我们一行约三、四人先是看了一阵沿江的街景,然后趑进一家面馆,黑板上赫然写着:素面,8分钱一碗。略一扫视,碗还真不小。于是,仗着自己前两天吃的不太好,也是一向在乡下养成的能吃的毛病,要了两碗面条。临了让厨师盛面时,他问我要红油还是清汤。我则不假思索地要了红油。因为据我曾从武汉获得的经验,清汤指的是馄饨。两钵碗面端了出来,每一碗上面堆着红红的、高高的辣椒酱。看一眼,心中想道,不就是辣椒吗,吃。使用筷子将其中的一碗面搅和了。那香味正好与那馋欲相接,急切之中,一大挂面已然送入口中。常言道,人生总有几次万万不能的窘态。我想这应当算一次。那面条的先头部队已进入了喉头,大部分挤满了口腔,然而,我的全部神经系统此时却已被辣瘫痪了,呼吸处于窒息状态,眼泪奔涌而出,而更多的面条还在嘴外挂着,等待进入。我已不记得那些铭记终生的面条是如何让我拔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第一次知道了真辣。

这样的经历好像并不完结,入学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依然图便宜买了一份5分钱的小炒:辣椒炒生姜丝,外加花椒。这一回考验我的似乎主要不是辣,而是麻。我只记得张着的口大约有一分多钟未

能合上。至此,麻辣四川算是让我全享受到了。

西南迎接我的,更精彩还在后头。

由于辗转迎新,我们抵达学校时已是黄昏,被安排进东山大楼南楼四层楼梯口的一间大房。即使下了汽车到楼内的距离,我们也是踏着泥泞进入的。第一晚的事情我已不复记得,这或许预示着某些深刻的记忆将会接踵而至。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去北边的食堂(现在好像是印刷厂)吃西南的第一顿饭。出了东山大楼北楼北门,天地一片雾霭笼罩,到处都是湿漉漉的。5米外,便是一横亘的陡坡,虽然不高,却也有一米以上,坡中有几个人工凿出的土窝。这大概就是通往食堂的必由之路吧。我第一脚才下了第一个土窝,已然发现热心助人的泥泞想帮我走得更快一点,无奈我的后腿和上躯却不领情,争执之下,我只好服从引力定律,结结实实地仰躺在了黄泥浆之中。好个西南,居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与她亲密。只可怜,当时我一共才两套外衣,不好意思又将才换下的衣服再穿起。后来七八级的学兄告诉我,他们已命名这个学校为“稀烂政法学院”。我想这是非常恰当的命名,因为,至少我们在校的四年中,几乎没有走过像样的柏油或水泥路。那时候,一双深筒胶鞋成了每个人最好的代步工具。

二

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学期,基本上一头雾水。就像重庆是云雾的掳获物一样,那半年的我应该是一个标准的乖乖生。按时起床、就寝,上课前预习功课,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上课后还温习功课……。一个学期下来,除看过一些电影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外,几乎无有其他涉猎。期终考试时的那个准备充分,可能这一辈子都无可复比。记得考中共党史,开卷考试,我抱了20几本书去考场,结果一本也未动,两个半小时内竟一口气写下40余页纸的答卷,想来约有一万余字。

或许也算是一项记录吧。

寒假临近,心早已飞回家了。还是冒着蒙蒙的雨,踩着泥泞向家奔去。不过,这回坐的是火车,辗转贵阳、株洲、长沙、武汉,换了两次车,在立足之缝隙尚欠不足的车厢中站了20多个小时。我提了4件行李从重庆上车,开车后,我发现跟随我的只有一件,其余的已不知去向,神奇的是,贵阳下车时,另外三件居然也从另一车门下车了。

越是临近故乡,另有一番兴奋愈是按捺不住。在县城碰到了第一个熟人,第一句话叫我耳顺:国家真会养人,看把你养得又白又胖。终日不见阳光(我在重庆四年,只见过3、4次日出),能太白?好吃好喝,生活有规律,会不胖?

从县城到家的30余里地,同样的好话我听了很多遍。不幸的是,先期听来的耳顺,渐渐变成了不安和刺激:我是怎么啦,上大学前一番雄心壮志,恨不得吞山河、携宇宙,现在居然只落得了个养胖的结果,我上大学干吗?!

于是,我的第一个假期过得并不愉快。近20天的时间中,我一直在反省。我拟了一个计划,我要返还我的本来面目,不做乖乖生,要好自为之。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逃课,泡图书馆。此后的三年半生涯中,说来很惭愧,除民法、刑法是全程上课外,其他的课我能去30节(那时一门课通常开72或96课时,有的100多),已是出勤率很高的了。有不少课是哪位老师上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未去过他的课堂。

这年春季,我们开了一门古汉语课。任课老师中有一位老先生叫张紫葛,湖北松滋人氏。紫葛先生可谓年轻得志,然中年以后却极不幸,有长达十几年的牢狱之灾。那时他刚被学校接回,安顿在我们楼下的一间屋子中。他授课的班是我们年级七、八班,本来与我无干。然而,这位眼睛几乎失明老人的国文功底和生动的讲授却震惊了全校师生。他赤手空拳上教室,然而从《尚书》以下,至《史记》、《汉书》,竟是一路横背如流,课堂中的典故、轶闻直如秋风落叶,不让你失去看景决不收手。

我所在的寝室是由4、5、6、7班富余人员组成的综合体,其中有一位7班的杜震农同学正好受到紫葛先生这种富教的恩惠。第一节课下来,他就给我们天花乱坠地评论起来,叫我们这些无缘聆听的同学好不嫉妒、羡慕。

我决定去拜访、见识一下。

一分多钟便下得楼来,无所顾忌地敲开了紫葛先生半掩的门,放眼一望,房内一床一桌一椅,一老者枯坐于中,木无表情,想必就是紫葛先生了。随着我声响的进入,紫葛先生一改枯木坐态,以起身、笑容、亮钟般的声音来迎接我。少不了一番自我介绍,便很快切入主题:如何做学问。答案很简单,去背《古文观止》。

背《古文观止》?我将信将疑。也是初识的生分,又不便多问,便满腹狐疑地离去了。怀疑归怀疑,毕竟出自权威之口,也只好做了。于是,我每天便有了一新的事业:一天背一篇《古文观止》。

这一年的暑假,我留校勤工俭学,主要事务是照看宿舍,八毛钱一天。其实无事可做,每天坐在宿舍里,仍旧是背书、看书,只是必须开着门。

终于从背书中尝到了味道,最明显的是看古籍顺溜了。我开始阅读《周礼》、《春秋左氏传》、《诗经》之类的书。有一天,上刑法的董老师在课堂上告知:“剥夺权利是资产阶级刑罚之花”。我听了这话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所看到的周代古籍中似乎已有相关的规定。于是,我把我的看法说与紫葛先生,他认为可以做一番研究,正本清源一番。接着他为我开了一张书单,嘱我去重庆市图书馆古籍部查资料。

我拿着书单兴冲冲地走进了枇杷山下的重庆图书馆古籍部,接待我的是一六旬开外的老者。他看了我的书单,默不做声,便进了书库,一会儿,他抱出一大摞书。我迎头一看,着实吓了一跳,乖乖,全是线装书,而且,他还不止抱一次,前后抱了三摞。

布满尘土的线装书摆满了一大书桌。我心里却发着毛。虽然从前也见过线装书,可那只是一本算命的小册子。如今这么多闻所未

闻的线装书,我连前后左右的顺序都搞不清,如何是好。着实有点怪罪张老先生,如何不事前与我讲清楚,早知如此,我不来了。

哪知,更窘的还在后头。偌大的古籍部阅览室,好像只我一个读者,一尘不染的桌子、地面、椅子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最难面对的是那位老管理员,他老先生拿完书,就在我侧身边站定不去了。这一站竟似长达一个世纪之久,虽然事实上也就20多分钟。

汗流浹背,无地自容,心跳加速,……

我不知哪个词更符合当时的情态。我不得不坐下来,开始试图进入到这些密密麻麻、没有标点断句的竖排繁体古语文之中。太感谢神灵,约20分钟后,我终于找到了我所要的第一处。老先生静悄悄地离开了。

这一次查阅前后持续了20多天,有时回学校过夜,有时就住城内亲戚家。若干天后,我与老先生稍熟识了,他找了个机会向我坦露了那天站在我身边不去的原因。他说,“文革”开始以来,这些线装书就没有人摸过,我是第一个前来阅览的读者。他的站立是由不信任和愤怒支使的。不信任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敢看线装书;愤怒则是我的书单开列太多,让他辛苦了好几趟,若是看都看不懂,岂不太冤枉。他那天本想事后好好教训我一下。

心跳的学术历程就这样开始了。

在紫葛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几个月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一篇题为《剥夺政治权利考》的论文。自认为写得还不错,便署了我们两人的名,把它投给《学报》,结果在1981年第2期发表了。

这是我的第一篇真正的学术论文,它的最大意义应当是:我有理由走学术发展之路。

三

1980年的夏天,西南建校史上有一件值得提及的大事:两栋新修的学生宿舍在东山南边落成了。住了1~2年办公楼的同学们

(男生)终于可以搬离东山大楼,住上真正的学生宿舍。

为分宿舍忙了好一阵。结果我班男生31人,5间房无法均分,谁也不太乐意去多一个人的房间。关键时刻,学校来了一个通知:由于水压不足,六楼无法保证供水,故六楼厕所停用。同时,学校还在宿舍外修了一间很大的公用厕所。

这个通知本身并没有什么,无非告知了一个今后生活不便的事实,然而对我却碰巧了。我班有4间宿舍分在倒霉的六楼,我参观完了新宿舍和厕所、盥洗间后,便在通知面前站住了:既然厕所不让使用,岂不浪费可惜?既然分配房间多出一人,让出一个岂不可以摆平?既然宿舍有灯火管制,厕所是非管制区,岂不有既可以通宵达旦,也可以不用去教室抢座的好处?

越想越觉着可以动员一个人去住厕所。该动员谁去呢?想想还是自己比较合适。一是我是挑大粪出身的,不怎么怕臭(后来证明从隔壁和楼下飘来的臭味的确存在,在我多方采取措施后,那味道被减到了最低程度);二是住厕所所有风险,一朝学校不准,得狼狈回到7人间,一般同学不愿丢这人,我则无所谓,成则得之,失则就之;三是这主意是我想到的,不妨徇私一回,当仁不让。

权衡妥当,我便去商店买了门扣和锁,在尚未有同学进驻该楼前,将六楼西一侧的厕所上锁了(该楼在正中部位设有两厕所(南向)、两盥洗室(北向),七八、七九两年级从中分断,各一半,我们住西头)。

一开始,我把床、桌子、书等悉数搬入,作古正经地过起了“厕所生活”。后来,我的行为引起了年级和校方的严重关注,据说院务(党委)会议还专门讨论过两次,非让我搬出不行。

我首先应真诚地感谢一些师长,特别是景凡先生就此事给予我的惠照,是他在党委会上所作的有利于我的开脱性说明,大大地缓解了校领导之于此事的过分注意力,同时,年级办公室的两位主任也顶住了一些压力,以致学校直到最后都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让我得以在那间至今令人怀念的厕所中渡过了后三年的大学生涯。

为了有所表示,我也作出了表面的妥协,首先是把床搬出厕所,并保证决不在里面睡觉;其次是在年级办公室的关照下,保证在学校检查卫生、安全等大的运动时,不在厕所出现。就这样,我以耍赖、厚颜的方式赢得了一片奢华、独立、自主的空间。此后三年间,除极少时候外,我很少去教室、图书馆,我不用去占座,不用背书包,我可以天天看书至凌晨两点左右。我感谢当年院领导的宽容。

一千个日日夜夜,我在摆满了书的厕所中读《十三经》、《二十五史》、诸子百家、西方哲学、历史名著;我亦在厕所中思考,写作;我还在厕所中高谈阔论,招待师长朋友……。

总忘不了,当时已年过六旬的景凡先生、紫葛先生均不顾年高,专程爬上六楼去厕所看我。

总忘不了,凌晨1点左右,学兄顾培东、江必新会突地推门而入,带来几个罐头、熟鸡蛋、一瓶小酒,然后便是一番酣畅。

总忘不了,程燎原、陈晓光、刘荣军、段书臣等同学定会或经常、或每天来厕所报到、聊天。

总忘不了,夜半突遇暴雨,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冲进厕所关窗户,抢救已浸泡在水中、接了几十节的电灯线,有时竟被电击得乱跳。

总忘不了,搔首拔发、掩卷思书,喟然长叹,时而困惑,时而豁然,或惆怅,或欣喜的长夜。

四

每个人都会有他特别投缘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是你的老师、同学或其他相契者,他们对你的影响和意义通常是无价的。根据自我观察,我的为人和行为不太容易得到他人,特别是领导者的欣赏和同意,这无疑是生路逼仄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并非总是倒霉蛋,过去的生涯中,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师长对我的关爱和栽培,让我终身受益。我现在要说的其中一位是景凡先生。

景凡先生是西南的权威人物,也是西南的脊梁。我上学的时候,他已60多岁,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科研处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院党委委员。素闻他是一位“狠人”,一般人不敢贸然见他。

我决定去拜见他,已是大二的时候。由于他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与我的兴趣相关,便去请教问题。殊未料,这一相识对我的终生却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属于很投缘的那一类。初次相识后,便可以长谈寅夜。按某些标准,我不能算是景凡先生的嫡传学生,因为我没有履行官方规定的“入门”程序,然而,无论就我的感觉还是景凡先生的想法,我应当是他最没有疑问的学生。从初识以后的近三年间,除外出、回家之外,我们之间几乎平均每周有一次长谈。即使他生病、不适之时,这样的交谈也不曾中断。我们谈历史、法学、哲学、文化,也谈一些人生问题。我想这些足以为上述的师徒关系提供证明。这样的教育方式大抵就是孔子的方式——在交谈中完成知识、道、德的传递。

三年级的某一段时间,我曾想报考研究生,为此,我和景凡先生均作了些准备。我发疯地学外语,高峰时竟至每天18小时。景凡先生则表示,愿意再招一届,如果我不考,他就放弃招生。在没有人教授、指导的条件下,自己想当然地狂学、狂背许国璋《英语》前六册,一时之间,所谓的“单词量”达至了很高的水平。然而,我是那种勤奋有余、先天欠缺语音感的蹩足型人。外语终于还是成了本人此生的莫大缺憾。从三年级下学期决定放弃高学历的诉求后,20多年来,我几乎很少再去看外语,竟已差不多回复到了外语盲的境地。

我放弃研读的原因并非一样,和景凡先生的性格冲突可能是当时的一样直观考虑。一年多的师从,我已隐隐看出,我与景凡先生的投缘其实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划定在知识和学术研究之间。以他和我两人的个性,一旦突破边界,我们之间的争执就非常大,以至于可能反目成仇。我不愿意看到我们之间美好的关系埋葬于这样的冲突之中,我决定逃奔为上。这样,我们会有终生的友谊(毕业三年后,我们远隔几千里,但为了“周公”而起的争执,几乎白炽化了,证